

互联网历史学的前沿问题、理论面向与研究路径 ——宾夕法尼亚大学杨国斌教授访谈

吴世文

摘要

本文通过对杨国斌教授的学术访谈，探讨互联网历史学的前沿问题、理论面向与分析路径。杨国斌教授认为，网页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记录、反映并改变社会。互联网历史研究可以从网页、网站的层面出发，重视历史叙事和技术发展的历史性，并解决历史分期、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尤其是，互联网历史研究需要摆脱宏大历史叙事与微观历史研究的局限，从中观历史维度切入，通过研究案例或细小的现象，勾连大问题。针对社会科学重理论轻描述的倾向，互联网历史研究有必要强调描述性叙事的重要性，关注互联网中的鲜活个体及其使用经验，“深描”其网络生活与人的故事，并通过个体经验与个案研究来洞察整体的、大局的社会变迁。互联网历史学的写作，需要建设网络历史资料档案，包括网页、网站资料的档案，也需要口述史和网络自传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关键词

互联网历史学、中观历史、地方性经验、网络自传、历史性、历史叙事

作者简介

吴世文，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电子邮箱：buochun@126.com

本访谈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资助（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Internet historiography: Issues, Theories, and Methods Abstract

Wu Shiwen

Abstract

The article explores key issues,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internet historiography through an academic interview with Prof. Yang Guobin. Yang argues that web pages are an organic part of the society, recording, reflecting and changing society. Internet history research may start with Web

pages and websites. Researchers should emphasize both historical narration and the historicity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ociety. In view of the limitations of macro-history narratives and micro-history research, researchers might opt for the writing of mid-picture history. Mid-picture history allows researchers to tap into big issues through case studies or concrete phenomena. More emphasis on narrative description may be a healthy antidote to the overemphasis on explanation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arrative description gives voice to individuals and their lived experiences on the Internet, while still shedding on broad social changes. Methodologically, internet historiography may combine the building of internet archives with 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oral histories and individual autobiographies of internet use.

Keywords

Internet historiography, mid-picture history, local experiences, individual autobiography for the internet use, historicity, history narrative.

Author

Wu Shiwe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d a research fellow in the Center for Studies of Media Development at Wuhan University. Email: buochun@126.com.

This interview is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杨国斌是宾夕法尼亚大学Grace Lee Boggs传播学与社会学讲席教授，主要研究数字媒介与社会理论、社会运动、在线抗争、全球传播、文化社会学、中国的媒介与政治等。杨国斌教授是社会运动、数字媒介研究领域的名家，出版专（编）著8本，其中，《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中文译本《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专著，获得了国际国内学界的广泛赞誉。近来，他延续对互联网研究的独特思考，针对互联网历史研究提出了诸多很有价值的命题。2017年夏天，他在浙江大学、苏州大学和重庆大学举办的暑期班上讲到过这个话题，引起了不小的共鸣。互联网历史学是一个前沿研究课题，访谈人就互联网历史学研究深入访谈了杨国斌教授，以期为推动互联网历史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启发。

一、互联网历史学：全球层面的发展与地方性经验的贡献

吴世文（以下简称吴）：近年来，互联网历史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

注。就在2016年,《互联网历史:数字技术、文化与社会》(《Internet Histories: Digital Technology, Culture and Society》)杂志创刊。两本重要的编著《The Web as History: Using Web Archives to Understand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Brügger & Schroeder, 2017)与《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Global Internet Histories》(Goggin & McLelland, 2017)在2017年出版。请问互联网历史研究在国际学界有何发展?

杨国斌(以下简称杨):我感到互联网研究界现在对于历史很是关注。有两个观点值得我们格外注意。一是要从美国中心主义向多元的、全球的互联网历史转向。因为互联网的诞生与冷战期间的美国军事研究有密切关系,而且最早在美国获得发展,所以谈互联网历史往往是以此为起点,讨论其如何扩散,并且往往是以技术为中心的。这个美国中心主义的倾向正在改变。

另外一个观点,是要从互联网技术史的研究,转向内容与文化的研究。比如,研究中国互联网的文化或是日本的,或是韩国的、英国的、德国的,你就一定会看到互联网历史是多元的、复杂的,会受到在地的社会历史等各种各样的因素的影响,从而呈现出非常多元的面貌。因此,我们研究中国互联网历史,实际上对全球互联网历史学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而且是全球互联网历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众所周知,中文互联网的发展及其影响格外大。

吴:互联网首先是一个全球性的互联网,但是,阿巴特(Janet Abbate, 2017)提醒我们,需要从“技术、使用与地方性经验”的维度重新定义互联网。这意味着,互联网使用的地方性经验或者说区域性的互联网不容忽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互联网历史研究在美国和欧洲比较兴盛,但是在全球其他地方的发展还不足。对于中国互联网历史的研究,您观察到有哪些开端或发展?

杨:互联网历史不是现在提出来的新研究领域,其实国内一直都有人在做,但是各有各的方法,各有各的侧重点。比如较早关注红客、网络民族主义的海内外学者有闵大洪、邱林川、周永明、吴旭等。从文学史的角度关注网络文学的,有国内的欧阳友权、国外的贺麦晓(Michel Hockx),我自己也写过相关的文章,把中文网络文学的历史追溯到早期的海外中文网站。此外,从历史发展角度,关注网络与社会抗争及民间社会发展的研究,也有不少。这些早期的研究,多少会触及当时的网络发展状况,尤其是对早期BBS的历史和文化,都有所勾勒,如今应该算是难得的历史资料了。胡泳出版于2008年的《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胡泳, 2008),就专门有一节讨论各类早期的网络形态,从电子邮件组、BBS论

坛、聊天室到博客都有。我在2003发表的几篇关于互联网与公民社会的论文里，也有不少早期BBS论坛资料的呈现和分析。后来在2009年出版的《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Yang Guobin, 2009）英文版中，每一章也都融进了一些互联网历史的叙述。最多的一章是在讲网络社区这一块儿，用了一部分我当时所收集的互联网历史材料。

专著方面，我想彭兰教授写的《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彭兰，2005）应该是国内第一本比较系统地讲互联网历史的书，但是它的侧重点是把互联网作为媒体。书里面也讲到了一些论坛、一些大的事件，并在写作的过程中引用了很多当年论坛的帖子。这实际上保存了一部分已经消逝的互联网历史，现在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还有一本书，书名是《天涯虚拟社区：互联网上基于文本的社会互动研究》（刘华芹，2005），也是一本非常好的实证性著作，作者刘华芹是人类学者。天涯社区在早期中国互联网历史上，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刘老师写的天涯社区是早期的，还没有改版之前的。该书对早期的论坛、帖子等做了系统的资料收集与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也为我们保留了很多珍贵的网络历史资料。

二、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基础：网页与网站档案

吴：互联网及其包含的范畴、内容都比较复杂，既有技术的和结构的因素，又有文化的和使用的要素。这给互联网历史研究带来了挑战，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切入？

杨：我觉得应该以网页和网站作为基础，切入研究互联网历史。网页、网站应该是社会的一部分，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我们在谈论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的历史的时候，不能不研究网页，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是网页记录与反映社会。网页一方面记录社会，一方面也反映社会的变化。比如网易早在1997年就提供免费个人网页，当时很多人开始接触网页，做自己的网页。当年的很多个人网页有点像公开的日记，非常个性化。再比如2016年的雷洋死亡案，在这个事件产生的过程中，网络上留存下来的帖子，相当于原始档案。因此，我们在网络上发帖子，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一种记录，这些帖子是历史的一个部分，同时在创造和反映历史。

二是网页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早期所有网上的东西，比如文学网站、民间环保网站等等，都是社会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是网页改变社会。这一点也非常重要，网页、网站、网民、网络话语、网络事件、网络大V，甚至网络谣言等，都可能成为改变社会的一种力量。我们且不说网络事件是如何影响政治、社会与文化的，且不说网络文学如何影响了当下的网络文学产业以及网络表达机制，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社会的一种改变。

作为学者与研究者，有责任和义务来关注互联网历史，因为通过研究可以保存部分历史，有时候还可以拯救已经消失的部分历史。甚至说，普通网民也应该有责任与义务来记录互联网历史。

吴：您提出从网页或网站入手来研究互联网历史，这很有必要，也令人耳目一新。不过，网页和网站非常之多，而且容易消失，如何去研究它们呢？

杨：应该有针对性地选择。可以按内容选择，比如我对环境保护和网络文学感兴趣，便有选择地保存环保组织和网络文学的网页内容。也可以按办网站的单位或个人来选择，比如政府网站、商业网站、个人网页，等等。还可以按事件来选择，比如在网络事件发生的时候，选择保存论坛上或微博上的相关互动内容，等等。

如果网页和网站还在运转，内容还在，还好办一些。难度较大的是很多网站已经消失，相关的资料难以还原或不复存在，那怎么研究。应该从现在开始，就有这样的意识，网站随时会消失，因此随时应该有针对性地保存内容，就如同保存了历史。

如果把网络历史想象成一本大的历史书，网站关闭或网页消失，就如同这本书的页码被撕掉，有人会写悼念文章。在网络空间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百度空间消失了，会有人写哀悼百度空间的文字；博客被关闭了，会有人写沉痛悼念我们的博客；北京大学原来有一个BBS叫“一塌糊涂”，它被关闭之后，有人写“悼念糊涂”。这些悼念性质的文本，可以成为我们研究网页或者网站的材料。

说起哀悼网页或网站，有必要谈谈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两本著作，一本叫《友爱的政治学》（德里达，2011），另外一本叫《追念集》（《The Work of Mourning》）（Derrida，2001）。德里达在世的时候，跟不少大思想家、哲学家都是好朋友。每一个朋友去世，他都写一篇长长的哀悼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汇集成书，名字就叫《追念集》。这本书的编者导言已有中文翻译，李公明先生曾在《东方早报》上写过介绍性质的文章（李公明，2013）。德里达在写这些文章时，思考了怎样来写哀悼文章，或者说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应该怎样悼念去世的朋友，或者悼念一段历史。

这本书的编辑是在德里达去世以后，编者在序言里把德里达的哀悼性文章归纳

为一种“哀悼政治学”，建立在德里达的友谊法则之上。那友谊的法则是什么呢？一个朋友总要先死在另一个朋友之前，幸存的那个朋友就有了悼念死者的责任。这是德里达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友谊法则。

但是，当你真的去写文章悼念朋友的时候，困难就来了。德里达讲了三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他认为沉默与发言都是不可能的，你不能表示沉默，因为你要哀悼去世的朋友。但是，发言也非常困难，因为当无法不发言的时候，必须要充分地警惕发言中的私心和失实的危险，尤其是利用死者的危险与自恋的危险。

第二，在哀悼去世的朋友的时候，往往大家赞美之辞较多。德里达认为，不应去漂白友谊中充满黑暗色彩的部分。比如他在哀悼福柯时，也会把各自的分歧讲出来。但这并不是盖棺论定，而仅仅是把分歧讲出来，呈现给读者，希望提供新的化解矛盾的可能。第三，在悼念中必须有问题意识。对朋友及其作品致敬的方式，是“不仅见证它所教给我们的东西，而且见证它所开启的问题，它所留给我们的问题”。德里达认为，“我们是这些问题的后裔，要为这些问题负责。只有通过回忆这些问题，回到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有一个未来。”¹（Derrida,2001:154）

我认为这些思想可以用来“观照”我们对于互联网历史的书写。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经营不良、技术更新换代等，每天都可能有不少网站关闭，这是互联网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网站给大家的记忆格外深刻，因为它是当年非常活跃的社区，或者很多人在那里有大量的情感投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写一些悼念性质的文章。

悼念网站和悼念朋友有相似之处，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德里达的“哀悼政治学”来探讨部分互联网历史。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有一个假设：假如我们用德里达的“哀悼政治学”去谈论互联网历史的某个部分，那么，我的出发点就是设定网站是否等于朋友？如果网站不等于朋友，那我们就没有必要把德里达的友谊法则、“哀悼政治学”挪用来考察互联网历史。但是，如果网站的确可以作为朋友来看待的话，那就有可能把那些原则和理念借用过来。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有责任与义务去哀悼比你先去世的朋友。我们的前期研究发现，网友在记忆消逝的网站时，确实把网站作为朋友对待（Yang Guobin & Wu Shiwen, 2017）。

吴：网页或网站的数量非常庞大，有关互联网历史的研究资料也有很多，那么，应该从何入手获取研究资料？有哪些资料可以收集与使用？

杨：资料的种类应该很多。首先，比如像《互联网周刊》、《网络传播》这类

报刊、杂志上有很多相关内容，经年累月，有很多可资使用的历史资料。第二，网络上散落着很多有价值的资料，比如网上的帖子、文章等。我手头的文件夹里，随便打开一个，看得到有早些年下载打印下来的文章，如“中国博客发展大事记”（1.3版，2005年）、“值得关注的大陆20个个人主页”（2000）、孤云的“中文论坛的夏天过去了吗？”（2002）、“2001年中文论坛过眼录”（2002）、“我眼里的中文论坛”（2001），笑蜀写的“学人网站的兴起和发展”（2000），等等，都是很好的历史资料。

第三，早期的邮件组内的通讯、简报等，也有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如1990年代中期开始建立的专门交流互联网技术的邮件组CINET-L Newsletter（China Internet Technical Forum）、讨论CERNET建设的邮件组ICC-L，等等。我手头有一份1995年6月18日的CINET-L的通讯，第一篇文章题目是“热气腾腾的冬天——中国交互网一年回顾”。光从题目看就很有意思，说明那时候互联网还有一个别名是“交互网”。

第四，国内外出版过不少学术性的文章和著作，里面常常有可参考的网络历史资料。除了上面提到的胡泳的《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之外，如刘连喜（2007）的《新媒体论——CCTV.com的第一个十年》，勾勒了CCTV的网络历史；雷蔚真（2012）的《网络迷群与跨国传播——基于字幕组现象的研究》里面关于跨国字幕组的资料，等等。

第五，除了学术性的著作，国内还出版过一些类似于文集、汇编、访谈之类的书籍，也保存了不少网络历史资料。我的书架上就摆着《我点击我存在》（2004）、《无厘头文本——网络时代的愤青》（2004）、《闪客江湖》（2006）、《超人气论坛大搜罗》（2006）、徐静蕾的《老徐的博客》（2006）、林木编著的《网事十年——影响中国互联网的一百人》（2006），等等。

第六，是研究者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访谈，搜集口述历史资料。我从微信上看到，方兴东先生在做口述历史的工作，应该说是功莫大焉。

最后，历史学家依赖档案资料来研究历史，互联网史家最重要的资料，也应该是互联网档案资料，包括网页、网站资料。

吴：正如您所说，史学家依赖档案资料来研究历史，如何获取和保存档案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我想这也是互联网历史研究的一个挑战。对于数量庞大的网站和网页，如何保存和建立档案？

杨：互联网历史研究跟传统的历史研究一样，一定得有档案资料。我认为现在

尤其要强调当我们非常关注互联网发展状况、互联网政治、互联网文化时，还要考虑如何收集资料、如何建立档案。虽然互联网档案建立的难度非常之大，但是在做的过程中把收集资料的过程记录下来呈现给读者，这样读者也会知道资料收集的努力与局限。

在国际上，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做了很久。有一个国际组织叫“国际互联网存档联合会”（International Internet Preservation Consolidate），不少国家的很多机构都加入了这个组织，中国国家图书馆也是它的会员。联合会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探讨如何保护、保存互联网空间的资源；二是如何开展这方面的档案研究。

英国有一个这方面的网站（<https://buddah.projects.history.ac.uk/>）。该网站实施对网站、网页的大数据收藏，是网络档案馆的子项目，里面也有很多关于互联网历史的文章。

当我们谈论建立互联网档案研究的重要性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档案可以建立呢？根据研究的题目而定，有很多可能性。前面我提到了可以按照主题来建立档案，比如关心环保组织的发展或者环境的发展，那么就以这个主题来尽量系统地收集资料。可以按组织机构来建立档案，比如英国公司的网站历史，研究20年来某公司网站的演变。还可以把事件作为线索，围绕某个事件来建立档案。

美国国会图书馆关于网页档案的项目非常多。比如说去年美国总统竞选，很多竞选人都有自己的网站，它就把那些总统竞选人的网站都保存下来。再比如关于“9.11事件”的档案，内容非常丰富，有图像的、有文字的，也有视频的，还有一些记忆的叙事，关注大家在9.11后的反应。

美国圣母大学研究中国网络文学的贺麦晓教授，前不久给我推荐了一篇介绍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络资源的文章，题目是“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络资源保存的实践与探索”（张炜、敦文杰、周笑盈，2017）。文章提到中国国家图书馆2003年开展“网络信息采集与保存试验项目”，2007年加入国际互联网保存联盟，2009年成立国家图书馆互联网信息保存保护中心，也在致力于网络信息资源的长期保存和利用服务。

文章还提到，目前国家数字图书馆全面保存的网络资源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党中央各部门及直属事业单位网站；全国人大、政协，以及其他与国家立法、决策相关机构网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国务院各组成机构及其直属单位和行业协会网站；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网站；中央级社会团体网站等。重点保存的网络资源包括：我国经济领域重要机构、组织、研究单位网站；我国重要的科研

教育机构网站；我国历史文化、传统艺术、地理人文、科技科普、国学研究类网站和专题；国家一级博物馆、省级及以上主要美术馆、艺术馆、展览馆等公益文化类机构，以及重要图情组织机构网站；我国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纪念馆及专题网站；我国社会保障、劳动就业、人才法律、人口健康等领域重要机构和网站；国土资源监测与利用、环境气象、生态保护、防灾减灾等领域的重要机构、研究单位和专题网站；国家重大项目和工程建设网站；国际重要组织机构、国外主要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官方网站，及其公开发布的重要文件和资料等（张炜、敦文杰、周笑盈，2017）。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而珍贵的网络档案资料，但是缺少的是普通网民的网络生活和交往的资料保存。有心的研究者，可以从下载、收集、整理、保存普通网民的网络资料出发，为自己的研究做文献储备。保存网页、网站的资料都是重要的手段。

三、互联网历史研究的理论观照及其分析路径：历史性与历史叙事

吴：历史对于当下和未来具有重要的价值。“论由史出”，对于互联网历史研究这样一个正在兴起的研究领域，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去发展理论与方法？

杨：我主要谈论两个方面，一是历史性（historicity），二是历史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

对于互联网自身的历史，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叙事，我们可以用传统历史叙事的一些方法来做。而历史性（historicity）与历史叙事不同，历史性就是任何事情都会有它的历史，比如互联网发展到今天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只有研究它的历史性。

再比如，人民网舆情研究室这几年发布的舆情报告，显示最近几年网络事件的正能量比较多，负能量比较少。对于这样一个发现，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普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历史性的发现。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提的问题是，为什么这几年网络事件的正能量比较多，负能量比较少，有什么样的历史原因？反过来说，很可能十年前的网络事件的负能量要大大高于正能量，那又是什么原因？这就是历史性，不仅仅谈论历史的背景，而且谈论历史的过程，如何造成了现在的某种结果。其实我们还可以追问，什么是正能量，什么是负能量？正能量和负能量这类话语，其产生与传播的社会和历史环境是什么？

我是社会学家，但是社会学家跟历史学家中间没有隔着座大山。社会学有一个重要的领域叫“历史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家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某某事件按照它的时间顺序，通过叙述方法呈现出来它的发展，它与社会、政治等其他条件的纠葛

(figuration), 就有可能发现如何解释这个事件。所以历史本身就是它的叙事, 而且带有一种解释性。

互联网研究产生了很多概念和理论, 任何理论与概念都有它的历史性。也就是说, 没有任何理论和概念是不变的真理, 它们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历史的局限。我们理解概念, 应该分析它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出现,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被使用而且开始流行起来, 为什么其他的概念没有流行起来。这是它的历史性。因此, 在互联网历史研究中, 我们需要考察概念与理论的历史性。

吴: 强调概念的历史性,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与使用概念, 能否请您进一步解释一下?

杨: 在互联网研究中, 新概念频频出现。如果在使用时没有充分辨析, 不考察概念的历史性, 则容易导致概念的使用混乱不清, 甚至是混淆视听。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威廉姆斯, 2005)一书, 讨论了概念的历史性。他在书中对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做了历史性分析, 揭示出词语背后的社会情感结构。

在国内, 关于传播思想和观念史的研究, 已经有一些重要的作品出现, 比如刘海龙教授关于宣传概念的研究(刘海龙, 2013)。但对于跟互联网和新媒体相关的概念史研究, 文献还不太多。我最近看到的是北京大学胡泳老师和陈秋心写的《舆情: 本土概念与本土实践》(Hu Yong & Chen Qiuxin, 2017)。该文对“舆情”的概念及其使用进行了批判, 指出“舆论”与“舆情”这两个术语在当下被广泛混用, 其实它们各有自己的发展路径和现实意义。

相比中国的互联网研究, 国际传播学界对互联网和新媒体概念的历史性的关注, 已有较长的历史。例如, 对互联网和数字文化关键词的关注。2016年出版的《数字关键词: 信息社会与文化关键词》(《Digital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Benjamin Peters, 2016)一书, 秉承威廉姆斯对关键词的分析方法, 由25位作者对各自选择的一个关键词进行历史性的分析。这是互联网和数码文化研究者对本领域的关键概念进行的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

我选的词是“activism”(Yang, 2016)。当时在写activism的时候, 我对比了一下, 威廉姆斯的《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里面是没有activism这个词的, 他那本书里有“radical”这个词, 也有“革命”“暴力”“解放”这些词。《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于1976年出版第一版, 那时候正好经历了1960年代全球性的革命运动, 所以这些词就很自然地成为其书中的关键词, 因为这些词反映了那个

时代。

而activism居然不在它的关键词之列，我想为什么威廉姆斯的时代没有activism，而现在activism被使用的越来越多了呢？这就提出了一个研究问题。后来我利用google的全球书籍词频统计器（books Ngram Viewer）做了研究。

全球书籍词频统计器，显示词语在不同时期出现的频率。通过研究发现，在1960年代radicalism 和activism这两个词使用的频率差不多。1960年代以后radicalism用的越来越少，而activism用的越来越多。比较一下Activism和revolution这两个词，大致也是同样的变化。

这很能说明问题。美国社会学家研究过1960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的变迁。他们基于芝加哥地区社会运动的一个大型数据库，研究当地的社会运动以及它们的形式。研究发现，197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变得越来越非激进化，社会运动不是去正面对抗或去扰乱社会秩序，更多的形式是街头的小节日，或者是NGO组织的一个小活动，志愿者对社区的服务，等等。因此，当我们以这样一个宏观的视角来看问题，就发现activism慢慢变为主流话语，实则反映出社会和政治气候的变化。1960年代以后，革命的话语在美国文化里开始淡出。这也是一种“告别革命”的话语。

吴：您前面提到，互联网历史研究还涉及到历史叙事的问题，请问如何理解这个方面？

杨：首先，所谓叙事，指的是描述与解释。谈论历史叙事的时候，常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描述性的叙事与理论解释之间的关系。1990年代初，历史社会学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及一些社会学家内部发生了很多争论，历史学家认为社会学家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历史事件就空谈概念，而社会学家则认为历史学家仅仅是在描述，没有大的理论发现。对于历史社会学来说，就是要解决这些争论，在描述性的叙事与理论解释之间取得平衡。

历史学家的叙事本身是描述，但绝不是简单的描述，而是通过描述，现象与叙事之间不停地对话，实际上提供了对于事件或现象的解释。我认为叙事描述还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我们书写互联网历史的过程中。

第二，历史分期问题。谈论互联网历史，是否需要分期，以及如何分期，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有的学者不主张分期，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的历史书写中，分期会有一种线性思维主导的嫌疑。因此，有学者提出了没有历史的历史。一篇叫《History without Chronology》（Stefan Tanaka, 2016）的文章提出，历史总是断裂，无论历史呈现得如何完整，它都是有选择性的，肯定是有遗漏的。因此还不如

放弃宏大叙事的写法，从历史的任何一个节点切入，都可以解释一定的历史现象。

第三，个人与社会。谈论历史叙事总是会谈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英国的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法国的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他们的理论之所以影响比较大，是因为他们努力打破个人与社会的二元结构，并努力建构二者新的关联。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看看我们如何在研究互联网历史的实践中，通过个人的实践揭示社会的变迁。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2013）著有《文明的进程》一书，他研究中世纪时期欧洲国家的人民，怎样慢慢地进入到他所谓的现代化的“文明社会”。比如说早期的时候，欧洲人在饭桌上的一些行为举止，用今天的眼光看，是不检点的，但是他发现慢慢的，这些行为变得越来越文明了。他说在这个进程中，现代国家建立起来了，很多现代社会的规范也随之建立起来。那到底是结构影响了个人，还是个人影响了结构？都不是。他说是在各种因素互动的情况下，逐渐地产生了这种新的格局。因此，个人与社会相分离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是不合适的。

吴：您在这里讲到了宏观与微观的问题，那么在中观层面，应该如何去开展思考？

杨：早期的历史书写，常常是大历史比较多，但是历史学家这些年好像摆脱了大历史的写作框架。我记得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老师在2012年写过一篇文章，说早期的大历史写作早已过时。在如今的美国历史学界，如果想在博士毕业后找到一个教职，那必须是写微观历史，即必须找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问题，写成一篇大的博士论文。那么，你就成了这个小问题的专家。不少人现在可能主要还是在做微观历史。微观历史虽然做得细、做的深，但是有时候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社会意义。

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重新意识到，一方面要把一个问题做得很深入，另一方面也还是需要讨论重大问题。因此，他们提出来应该发展中观（mid-picture）的历史书写。我觉得这对于互联网历史研究是很有启发的。通过案例研究，看到一些大问题。或者研究小的现象，但是在切入这个现象之后，还能够将这个现象跟大的问题勾连起来。同时，主张中观历史书写的学者也认为，当下的历史学家写微观历史写得很深，但是最后只有几个专家看那本书，别人不看。这就失去了历史书写的公共意义。因此，历史还是要写的能够让大众阅读，不能用太多专业术语。我觉得社会科学的著作，也应该能够让大众阅读才好。美国社会学界曾经讨论过走出象牙塔，建立公共社会学的问题。国内的社会学界，如清华大学的沈原教授等，对公共社会学的问题也做过深入讨论，值得传播学者借鉴。

我非常认同这样的主张：通过案例研究，思考大的主题，并能让大众阅读。如

果互联网历史书写可以从一个案例出发来揭示大问题，另外不要用太多抽象的概念与理论，写出来的文字能够让大家都读得懂，我觉得这就是比较好的一种历史书写。

吴：关于互联网中观历史书写，您有什么推荐的文献吗？

杨：我推荐一本书，《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Fred Turner, 2006），2006年出版，作者Fred Turner是斯坦福大学传播学系的教授。在书中，他以一个人以及一本杂志为核心，通过个案分析，呈现出1960年代美国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如何发展到1990年代的互联网文化。这本书写得很有趣。书中有故事，可读性强，同时也揭示了大问题。

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1960年代反越战的文化中，计算机代表了冷冰冰的、非人性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dehumanization）和官僚制度。为什么这样的技术，到了1990年代，反而成为个人赋权、共同体、团结、合作精神的象征？信息技术的文化意义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作者描写了一群人以及他们创办的刊物。反文化里面有两种人，一种积极参加反越战游行抗议，另外一种主要开展反文化活动，他们在更多的情况下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读书，读控制论，读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关于媒体的一些著作，读系统论，等等。控制论、系统论在他们这群人中就成为一种风尚，于是他们开始设想一种新的世界愿景，而这个愿景就是系统论跟控制论所描摹的。在这种条件下，信息系统可以把人们连接起来，使世界成为更加和谐的世界。因此，他们开始设想如何朝着这样的愿景努力。

Fred Turner把这群人称作“新共同体人”（New Communalists）。“新共同体人”放弃了政治，转向寻求通过技术以及个人意识的转变，来推动社会变革的道路。回归土地和乡村成为时尚，“公社”成为和谐的社会空间。他们通过小型的技术，如斧头、铁锹、锄头、投影器等等，把人们聚集到一起，体验新的人生。在公社里最重要的一点叫DIY，用我们的话来说，有点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意思。而DIY必须得有各种各样的工具，于是就“顺理成章”地创办了这份刊物，叫《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主要是卖工具。

这份杂志在当时据说影响极大，以至于乔布斯（Steve Jobs）2005年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的致辞中也提到这本杂志。他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本了不起的杂志叫《全球概览》，它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圣经……它有点像纸质的谷歌，却比谷歌早问世了35年。”²（Jobs, 2005）

在当时，这本杂志有点像是年轻人的“圣经”，其推崇的时尚与平等交流，形成了一种社会网络，对后来的新的互联网文化的出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

它的起源是什么呢？是越战。作者把这个过程讲出来了，不仅是讲技术，而且讲人的故事，讲文化变迁的故事。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中观互联网文化史。

四、互联网社会史中的鲜活个体：个人网络历史及其价值

吴：研究互联网历史，有多种切入角度。例如，从技术史、媒介史以及社会文化史等角度切入。在前面，您提到除了研究者之外，普通的网民也有责任和义务记录互联网历史，而且您也提到，需要关注个体的互联网历史，您为什么会提出这一主张？

杨：为什么要从一个人的互联网历史谈起？有很多原因。虽然互联网历史比较短，从1990年代中期到现在，但它是历史的。我们现在关注的焦点往往是眼前发生的事情，例如互联网政策、互联网公司的运作、新闻报业的命运等。早期的历史往往被忘记。不过，一旦我们回顾早期的历史，就会发现那个时候的互联网和现在很不一样。

在互联网的早期历史上，BBS论坛、聊天室、个人网页和个人博客，百花齐放，网民的注意力没有被少数个人大号（微信号）、大V和网络公司垄断。那个时候的互联网生态和现在不一样，越是不一样，我们就越应该回忆、记述、书写这段历史，发掘它在当时的意义，以及对当下互联网发展的借鉴作用。

互联网的早期历史，充满了活生生的个人。1997年网易提供免费网页，使得个人网页、网站一下子活跃起来。那时候我在写一篇关于中国网络文学的文章，收集了一批早期的海内外中文网络文学网站的内容。后来研究中国的环保组织，注意到早期的NGO也做网页，比如绿色北京、绿网等等。BBS论坛的资料搜集的就更多了。这些网页、网站、论坛里，活跃的虽然都是ID，却也都是富有个性和生命力的个体。

个人网页、个人网站实际上是自我的展示，就像日记一样。有个人做网站的，也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的，当然还有个人的博客，后来还有网上的写手。早期的一大批网络语言，如伊妹儿、斑竹、灌水、沙发、潜水、拍砖、网虫、大虾等等，是这批网民在网络的互动和交流中创造出来的。很多词我们现在已经不用了，但它们也是网络文化的一个部分，曾经是那样的鲜活，表现出人们对网络空间的向往。

早期有一大批网络写手及其个人的作品，他们都是以个人的姿态出现的，成为网上和论坛里响当当的ID。ID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符号，但实际上标志的是“活的生命”。现在也有网红，但现在的网红跟早先的著名ID，还是不太一样。更何况现在常常是几个大公司、或影响很大的公众号在运营内容。而早期的一些作品反而更

加个性化,比如最早的网络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后来被拍成了电影。这篇小说在网上流传很广,对互联网文化、BBS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推广作用。当时另一篇网络小说的影响也很大,是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他也是早期比较有影响的写手。很多年前,我在我自己曾经参与比较多的知青论坛里,结识了海宽、杰夫、老例、鹿鸣、号子等一批老知青朋友,虽然从未见过面,但当年的网上交流,却很热烈、很真诚。后来论坛几经关闭、迁址,那段网络生活算是结束了,但是那段历史还是有意义的。

这样的网络故事,多得怕是数不过来,应该写出来,不应该忘记。50年、100年以后,我们再回想这段历史,应该格外有意义。如果我们把当年的历史忘记,忘记的可能不仅是中国网络的历史,而且是中国的社会史。

吴:我听您讲到这些您个人的网络经历,也觉得非常有意思,确实不应该忘记。个人的网络历史对于互联网历史研究有何意义,我们应该如何研究个人的互联网历史?

杨:这里我想既强调个人,也强调历史。个人是生动而具体的,历史也是生动而具体的。个人和历史的反面,是抽象而空洞的概念。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提出过,我们做研究,与其满篇空洞的理论和概念,不如认认真真地描述生活,讲人的故事。为什么?因为只有具体的才是实在的、真实的。但真实的又是杂乱的。人的故事具体、实在,却又杂乱而真实。而一旦抽象成概念、上升到理论,活生生的人的故事就容易被抽离出去,剩下一副空壳。如此一来,杂乱而真实的故事,被规训为某个貌似漂亮的概念。我们现在很多研究,不缺概念也不缺理论,缺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世界。甚至可以说,生活世界的消失,往往跟片面的理论追求有关。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话,都是大家熟悉的,但真正到了自己做文章的时候,就未必还记得,比如这段话: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³(马克思、恩格斯,2009)

每一个网民都有一段自己的网络历史,正如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历史。但是,每个人的网络历史都不是独立于社会的历史,而是社会历史的一部

分。因此,谈论个人网络历史实际上就是讨论社会变迁的历史。当我们急于拥抱所谓大数据时代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把鲜活的个体生命遗忘?当我们研究网络事件、舆情事件的时候,是不是只看到冰冷的数字和没有面孔的群体?如果大家都在谈论大数据,那小数据的研究是不是就有了特别的意义?个人的故事也可以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通过个体的经验,通过个案的研究来洞察整体的、大局的社会变迁,这是历史社会学、也是历史学中的核心课题。

不管是讲人的故事、还是讲个体的故事,在方法上不一定真的只讲一个人的故事。虽说讲一个人的故事未尝不可,但人的故事是丰富而复杂的,因此人的故事可以是群体人的故事,一代人的故事,一个地方的故事,一个家庭、社区、单位的故事,等等。这其中的方法论问题,我想大家都熟悉,没有必要展开来说。但我想强调两个我觉得对写人的故事尤其好的方法。一个是口述史的方法,另一个是网络自传的方法。

我们想了解某个群体的故事,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请他们亲口把他们自己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可以请他们口头讲述,或者愿意的话,亲自写出来。这样的故事收集的越多,我们对个人和社会的网络历史、对中国互联网的社会、文化、技术的历史、甚至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了解的就越深入。(感谢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章姚莉协助整理访谈录音。)

(责任编辑:束开荣)

注释 [Notes]

1. Derrida, J.(2001). The Work of Mourning. Ed. Pascale-Anne Brault and Michael Nas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154.
2. Jobs,S.(2005).Stanford commencement address.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1/oct/09/steve-jobs-stanford-commencement-address>.
3. 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26页。(Marx, K.,& Engels, F.(2009.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Volume 1).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526.)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胡泳(2008)。《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雷蒙德·威廉姆斯[英](2005)。《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雷蔚真(2012)。《网络迷群与跨国传播:基于字幕组现象的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

版社。

李公明(2013年4月24日)。德里达《追念集》：哀悼文章的政治学法则。《东方早报》。

刘海龙(2013)。《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刘华芹(2005)。《天涯虚拟社区：互联网上基于文本的社会互动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刘连喜(2007)。《新媒体论：CCTV.com的第一个十年》。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诺贝特·埃利亚斯[德]。(2013)《文明的进程》(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彭兰(2005)。《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雅克·德里达[法](2013)。《友爱的政治学》及其他（夏可君编，胡继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张炜、敦文杰、周笑盈（2017）。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络资源保存的实践与探索。《数字图书馆论坛》，6，32-38。

Abbate, J. (2017).What and Where Is the Internet? (Re)defining Internet Histories. *Internet Histories*,1(1-2),8-14.

Brügger,N.,& Schroeder,R.(2017). *The Web as History: Using Web Archives to Understand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London: UCL Press.

Derrida, J.(2001). *The Work of Mourning*. Ed. Pascale-Anne Brault and Michael Nas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oggin, G., & McLelland, M. (2017).*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Global Internet Histories*. New York: Routledge.

Hu, Y., & Chen, Q. (2017). Yuqing: A native Chinese concept and its practice.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0, 33-74.

Peters, B.(2016).*Digital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anaka, S.(2016).History without chronology. *Public Culture*, 28(1): 161–186.

Turner, F.(2006).*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 Stewart Brand, the Whole Earth Network, and the Rise of Digital Utopia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Yang, Guobin.(2009).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Yang, Guobin. Activism.(2016). Activism. In Benjamin Peters, ed. *Digital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1-17.

Yang,Guobin & Wu, Shiwen.(2017). Remembering disappeared websites in China: Passion,community, and youth. *New Media & Society*,First Published September 23,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7731921>.